

20世纪
中国文学
研究丛书

新时期文学的追踪与阐释

Pursuit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Period Literatur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房福贤 ● 著



新时期文学的追踪与阐释

王德胜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世纪
中国文学
研究丛书

新时期文学的追踪与阐释

Pursuit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Period Literature

房福贤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文学的追踪与阐释 / 房福贤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6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4350 - 6

I. ①新… II. ①房…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305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门小微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装订印刷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25

插 页 2

字 数 303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博士点建设专项课题（HNSK[B]12-2）研究成果
海南师范大学省级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资助项目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总 序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谈及自己的学术研究时说：“我研究中国文化、社会、思想史，一向比较重视那些突破性的阶段，所以上下两千年都得一一涉及，但重点还是观其变。比如上至春秋战国之际，魏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下到清末民初之际，都做比较深入的研究。而至于一个时代定型之后没有什么太大波动的，往往置之不论，所以在学术思想史方面，我并没有从事前人所谓‘述学’或‘学案’式的工作。”余英时对“变动”的兴趣给人以极大的启发，而20世纪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极具“变动”特色的时代。在这一百年里，不仅发生了由大清到民国、由民国到共和国的转变，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主义与思想，也诞生了与传统迥然不同的新文学。时间虽然短暂，但由于处于历史的剧烈变动期，却留给了中国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巨大的活动空间。也正是这样的原因，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历史、思潮、文学等也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镇。“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就是我们作为当代学人对这个时代文学思考的成果。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重点学科、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中青年教师。海南师范大学成立于1949年，迄今已



有60余年历史。由于历史的原因，它经历了由学院到师专，由师专到师院再到师大的曲折过程。但无论什么时候，海南师范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都是学校的优势学科。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海南师范学院调整为海南师专，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全国学联主席、中国新诗的开拓者、时任华南联合大学文法学院院长的康白情，也被调到海南师专任中文系教授。虽然这是作为学者、诗人的康白情人生中与海南的一次短暂交集，且不乏贬谪的苦涩意味，但他的到来还是为当时海南这所惟一留存下来的高等学校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康白情在海南师专工作期间，虽然主讲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他作为五四运动的组织者、新文学的直接参与者，却给当时中文系的师生们以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当师生们得知郭沫若是因为读了康白情的《草儿》等新诗，“委实吃了一惊，也唤起了我的胆量”才开始写作新诗之后，他们对中国新文学的感受更直接了。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一向有写诗的传统，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向有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情，与此不无关系。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一大批优秀人才怀着创业的激情从内地来到海南，特别是海南建省之时，更出现了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盛况。本学科现在还在工作的几位骨干老师就是那时候从内地高校来到海南的。这些老师的到来不仅强化了当时尚在发展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而且，他们还以辛勤的努力和众多的学术成果让地处一隅的海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步入了国内学界的先进行列。20世纪90年代以后，海南师范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有了更好的发展机遇，不仅被批准为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重点学科，还被国务院学位办列为博士学位授予权建设学科进行立项建设，海南师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从此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就是我们这些年来学科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



本丛书的编写原则，以集中体现个人的研究方向、特色为主，不强求体例上的一致性。总体上看，这套丛书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明确的问题意识，是丛书的第一个特点。丛书的作者虽然都从事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普遍有着自己的专长与学术兴趣，有些问题已经研究了多年，有着比较深厚的学术积累，因而使丛书具有较强的理论建设意义。积极的创新意识，是丛书的第二个特点。丛书的作者特别是年轻的作者多是近些年来新毕业的博士，思想束缚少，学术上有冲劲儿，虽然有许多论题并非人所未论，但由于观点新颖，故而研究也不乏新意与创意。当然，我们也知道，由于研究者自身的局限，丛书的一些观点未必完全正确，学术质量也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不管怎样，如果这套丛书能够对读者在学术上有所启迪，我们的目的与愿望则庶几达成矣。同时，借丛书出版的机会，我们更加期望得到学界同行和热心读者的指教。

本丛书既是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重点建设项目，也是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博士点建设专项课题的成果，特记。

是为序。

房福贤

2012年5月1日

于海口金花村

目 录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总序	房福贤 1
------------------------	-------

上 编 文学现象阐释

新时期文学生成的时代文化语境	3
寻根文学与八十年代激进主义思潮	14
民族情感的民间表达与释放 ——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文学	27
新时期国共战争小说简论	39
走进战争舞台的女性 ——简论新时期战争小说女性角色的转变及其美学内蕴	53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家”传记简论	66
当下电视连续剧创作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83
从分化走向合流: 已见端倪的小说创作趋势	97
山东文化形象的三大构建模式及其现代传承与嬗变	104
《水浒传》与百年“好汉山东”叙事	121
《金瓶梅》与百年“世俗山东”叙事	138
《聊斋志异》与新时期“灵异山东”叙事	148
“文化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160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问题的三点思考	175
文学教育应当回到文学教育自身	188



下编 文学创作追踪

阴阳之道: 张炜与矫健创作个性比较	201
矫健: 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开拓	214
张承志小说审美表现的现代性	225
“俄底浦斯”情结与张承志的小说	234
寻找永恒的人生奥秘	
——钟海城小说印象	242
他们从微山湖走来	249
本色作家的本色写作	
——读老虎的小说	259
“无语”的张力	
——重读项小米的长篇小说《英雄无语》	269
卓以玉及其诗画世界	279
“义不忘华”的华裔作家水仙花	285
历史之思 青春之祭 家园之恋	
——读寒山碧的长篇小说《还乡》	293
论王蒙、从维熙与浩然的自传写作	306
《庄子的享受》的享受	324
王蒙古典解读系列的文学解读	337
李存葆“文化大散文”的绿色主题	357

上 编

文学现象阐释



新时期文学生成的时代文化语境

—

“文化语境”(Culture Context)指的是在特定的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The Field of Culture)。研究文学,不能不研究文化语境。1993年5月,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在谈到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问题时说:“我研究中国思想史,主张‘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也就是把思想史同经济、政治、社会的背景相关联。……‘语境化’很重要。如果认为只从哲学方面便可以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迁和未来,便就太简单。思想史的研究要成为一种文化史的研究。”^①尽管这里讨论的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但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同样有意义。

文化语境这一范畴有着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内容,二是文学阐释学意义上的内容。由于本文的目的主要是讨论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生成文化语境,文学阐释学意义上的阅读文化语境的内容此不赘述。

从文学发生学的意义上说,文化语境主要是指文学的生成文化语境,或者叫做生成文化场,是文学文本生成与存在的历史空间。一种文学思潮

① 《谁的思想史?——汪晖和艾尔曼的学术对话》,《读书》1994年第2期。



的出现，一个文学现象的产生，一部文学作品的问世，都是一定文化语境中的精神产物。由于文学文本的生成与文化语境有一定的对应性，它对文本意义的构成有一种主导性、制约性。文学的生成语境有两方面的含义。“其第一层面的意义，指的是与文学文本相关联的特定的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生活习俗、心理形态、伦理价值等组合成的特定的‘文化氛围’；其第二层面的意义，指的是文学文本的创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创作者、个体或群体的创作者）在这一特定的‘文化场’中的生存方式、生存取向、认知能力、认知途径与认知心理，以及由此而达到的认知程度，此即是文学的创作者们的‘认知形态’。事实上，各类文学‘文本’都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生成的。”^①第一层面的意义可以称为时代文化语境，第二层面的意义可以称为个体文化语境。

个体文化语境是一个文本生成的具体写作语境，它与文本关系最紧密、最原始，也最直接。文本是由作者写成的，在写作的环节上，作者的某一具体的文本就有着一个写作语境问题。从横向上看，它是受着某一事件、某一种心境的触动而引发了创作灵感；从纵向上看，它同作者以前的和以后的创作，同他创作之前的思想和在以后的思想感受之间的对话，就有着一种语境上的关系。它是在特定的“上下文”之间获得定位的。以50年代的王蒙为例。王蒙在1956年为什么突然写出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很显然，这有着他个人的生活的、思想的、创作的具体原因。最明显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王蒙正在北京西城区做青年团的工作。当时，团中央曾以组织的形式下发文件，号召青年团员向娜斯嘉学习。娜斯嘉何许人也？苏联小说家尼古拉耶娃的长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中的主人公。小说主要描写的是这位集体农庄的青年团员，敢于与官僚主

^① 严绍璦：《“文化语境”与“变异性”以及文学的发生学》，《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3期。



义作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的故事。但是王蒙在读过小说之后，却不以为然。他从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切身体会中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娜斯嘉式的人物虽然不少，但大多数人物却没能像娜斯嘉那样获得成功，相反，往往成了悲剧人物。于是，他便反其意而用之，创作了青年人有斗争的勇气却难以取得成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就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文本生成的具体文化语境。

当然，王蒙创作出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他个人具体写作语境的独特使然，体现着作者创作的文本在其整个创作的“上下文”的位置，但却不是孤立的。它的生成还同当时整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有关，这就是文学生成的时代文化语境。与个体文化语境不同，时代文化语境是一种较为疏远、间接的文本生成场域。它不一定是在当事人接触文学的时刻才产生，而是环绕着环境和人的一种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等不同要素组成的一种时代氛围。这一层面的语境虽较个体文化语境更疏远、间接，但却有着很强的“场效应”，对一个时代的文学起着重要的制约与导向作用。可以说，一个典型的时代文本，都与这种时代文化语境有着绝大的关系。还以王蒙为例。如果没有1956年开始的思想解放思潮，特别是当时对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评，会有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吗？当然也更不会有这一时期“百花文学”的出现。王蒙、刘宾雁、宗璞、邓友梅等人，其个体的文化语境是绝对不同的，但毫无疑问，他们都处在相同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受到了相同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潮的影响。正是这种共同性的影响造就了这一时期百花文学这一独特现象。同样，2005年在网络上爆红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虽然是胡戈个人灵光闪现的结果，但如果没有近些年来中国社会普遍蔓延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恐怕也是很难出现的。尤其是陈凯歌对此改编表示出极大愤慨并准备起诉



之后，国人对胡戈的普遍支持与对陈凯歌的普遍不满，都是时代文化语境产生的“场效应”。

时代文化语境对文学文本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他的创作必然会发生变化。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来说也同样如此。新时期中国文学为什么会发生整体性的变化？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影响并制约着80年代与90年代的中国文学生成的时代文化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

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文化语境，整体来看，是一种现代性话语占主导的变革文化。但变革又是不平衡的，具体而言，则体现为政治保守、经济渐进、文化激进的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社会态势。

“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了新时期。贫困的物质生活、长期的思想禁锢、畸形的社会关系，忽然都有望得到改变。百废待兴，大变在即而方向未明。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中国严重地落后于世界，一个曾经以拯救世界上2/3的人民于水火之中自许、以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思想的纯洁性自豪的民族，突然发现自己沦落到最贫穷落后的边缘，当然会造成强烈的思想动荡。加之对此前高度的社会控制的不满与日俱增，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追求。变革注定成为整个80年代的强势话语和文化发展的主旋律。

当代中国历史上这新一轮的变革与此前的变革不同，这一次的变革是在原有执政集团中衍生出来的新的政治力量领导下进行的，因此，它与前一种政治势力之间便有着不可剥离的联系。其基本的特征是，在变革过程中，政治上的变革相对保守，并不以激进方式彻底告别革命，而是采取相对稳妥的



方式进行。虽然在变革初期，为了打开僵化的思想观念，开展了真理问题大讨论，从思想上解决了人们的政治顾虑，解除了党内不肯变革的主要领导人的职务，但政治体制的变革还是相当谨慎的。特别是某些有损于现行政治体制的一些激进变革势力兴起之后，政治变革变得更为敏感。所以，第二代领导核心不断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政治上的反“自由化”一直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语境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与政治变革相适应的经济变革，是80年代中国的最主要的奋斗目标。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新时期以来最大的社会变化。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整个中国都在进行着全面的努力。但是，现代化如何实现，整个社会并无共识。“文革”被否定了，那么，回到“文革”前的十七年，还是另辟蹊径？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还是移植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短短的10年中，中国曾经进行过广泛的尝试。这里不仅有欧美的榜样，也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有苏联模式，也有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为代表的东欧模式。我们的经济改革比较成功的是农村改革，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与生产责任制的推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解决了几亿、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但是，随后进行的城市改革，由于面临的问题太多，许多措施并不很成功。特别是由于城市的改革与普通人的生活关系太过密切，所以引起的反响也是巨大的。比如物价的改革在一个时期里就曾引起很大的社会波动，甚至直接导致了80年代后期政治风波的发生。因此，80年代的经济改革，正如邓小平所说，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一直在往前走，但为了稳定的社会大局，基本上是一种渐进的改革，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在摸索中前进。